

□许志杰

叶圣陶促成 到齐大任教

朱东润是一位具有正统意识的传记文学家。据记载,有一次他参加一个讨论会时,批评陈寅恪名著《柳如是传》,认为把一个妓女出身的人描写成烈女般的正面人物,不符合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,致使出席会议的陈寅恪学生蒋天枢当即起身离席,使得整个讨论会气氛紧张。朱东润的这一举动,倒也符合他一生写作历史人物传记所把握的根本脉络,即传记应当首先用以表彰仁人志士,弘扬正气。在他的笔下,无论是张居正、陈子龙,还是杜甫、梅尧臣,无不以正面人物形象示人。世界观如此,文如其人,著作面目理所当然。

朱东润不仅为历史人物作传,还以钟爱一生的妻子邹莲舫为原型,创作了《李方舟传》。这本不到10万字的传记,以真挚感人的笔触,将自己与妻子近50年相濡以沫的日常生活,写得既平平淡淡又肝胆相照,情真意切。写完妻子的传记后,朱东润开始谋划写一部自传,自1976年2月15日动笔写起,于同年12月6日完成,全书近40万字,不到10个月写就,平均每月写作4万字之多。朱东润在自序的结尾写道:那年是“我的第八十一个生日”,《朱东润自传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9年1月北京第一版)共分十五章,其中在第十二章“六年流转”中,他用了比较简短、精练的文字,写自己在齐鲁大学任教的一些情况。多数介绍朱东润这段经历的文章,采用了笼统不细的写法,几乎一笔带过,有的甚至造成明显误会。

那么,朱东润是通过什么渠道来齐鲁大学执教的呢?从《朱东润自传》可见,他是在征得时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的意见之后而成行的。

抗日战争时期,叶圣陶与朱东润曾一起在迁址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,当时武大文学院派系林立,朱东润和叶圣陶都是后来者,无派无别,加上脾气、个性相投,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,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。抗日战争胜利后,武汉大学复员回籍,朱东润和叶圣陶也各自离开武汉大学,寻找新的工作机会。朱东润先后在中央大学、无锡国学专修学校、无锡第二中学、江南大学等学校任教。

1950年秋天,朱东润一边在无锡作学术研究,一边等待校方新的工作安排,但是这一等就是大半年,无奈之下朱东润不得不在1951年春节前返回老家,一是与家人一起过年,再就是在等待中看看有无其他的工作机会。

说来也巧,当时过完年不久,北京文学出版社就来信约朱东润去做编辑工作。朱东润便去江南大学告辞,然后从上海乘火车到北京,到北京文学出版社后,出版社方面也非常欢迎,但是由于北京文学出版社正在创办阶段,一切从零开始,甚至连起码的生活起居都无法保障,没有宿舍、食堂,办公室也没有固定下来。处于彷徨中的朱东润此时收到一封家



前排右三为朱东润

朱东润生前曾这样说:“我死后,只要人们说一句‘我国传记文学家朱东润死了’,我于愿足矣。”不知道朱东润先生什么时候说的这句话,但他一生创作了《张居正大传》《陆游传》《陈子龙及其时代》《杜甫叙论》《梅尧臣传》等多部传记文学,影响力至今不衰,誉称“我国传记文学家朱东润”名副其实。

1951年初春,朱东润到齐鲁大学任教约半年时间,在济南生活的这段时间里,朱东润对济南的自然风光,尤其是泉水赞美有加。

传记文学家朱东润 执教齐鲁大学往事

信,附有一张齐鲁大学文学院的聘书。他就去找老同事叶圣陶商量此事。

朱东润到北京文学出版社工作,应是叶圣陶的主意,若要离开当然需要征求叶圣陶的意见。朱东润向叶圣陶说了自己的两难境地,留在北京,北京文学出版社正处于白手起家的阶段,工作不容易做。转赴济南,又感觉与事理有悖,毕竟是北京文学出版社有约在先,齐鲁大学聘书在后。没想到叶圣陶听了朱东润的述说后,立即表态:“当然还是到济南为是。”

朱东润在自传中写道:“在这种情况下,我摆脱了北京文学出版社,没有在北京逗留,径往济南。”

对济南风光 赞美有加

齐鲁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,自1945年7月开始,齐大一直接处在动荡不安的南北迁址之中,先是在成都办学八年,复原济南以后,又远迁浙江杭州和福建福州办学,折腾之中齐鲁大学元气受到严重削弱。1948年济南解放后,齐鲁大学进入新的整合、编队阶段,尤其教师队伍亟需引进优秀人才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为适应新形势下教育事业的发展,齐鲁大学进行大调整,使之能够更加切实服务于新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。朱东润说:“齐鲁大学校址在济南,本来是一座教会

大学……以前我是不会去的,现在已经被人民政府接管了,所以就去了”。

对于济南这座城市,《朱东润自传》中说:“济南是一座山明水秀的城市……这时到处留着旧时代的痕迹。城墙还留着,但是因为曾经战事,弹痕累累,正在拆卸中。大明湖到处是残枝落叶,三春天气给人一副萧瑟的印象。千佛山不太高,上下也很方便,可是房屋太破烂了,断砖零瓦,完全是战后风光。只有趵突泉还是那么活跃,那么清澈。城里大街小巷,到处泉水淙淙,使人感到清新明快。”

虽然经历漫长的战争,城市遭到严重破坏,但朱东润对济南这座城市的自然风光还是赞美有加。

与济南遭到战争重创一样,齐鲁大学在历经成都、杭州、福州三地多年的迁址办学之后,教学资源极度匮乏。实验室缺少试验设备,图书馆图书散落各地,尤其是文史类书籍,用朱东润的话说“实在少得可怜”,不但中文书少,外文书也不多。当时不仅齐鲁大学如此,后来朱东润转到上海沪江大学,所见到的情况也是如此。于是,朱东润得出“洋人不读洋书”的结论,他还不无调侃地说,这些教会大学的教授到中国来,一口外国话是不错的,比中国人熟练得多,这是他们的特长,除此以外优点就不多了。齐鲁大学原来是由多个国家捐建的,因此每个国家都要保留

一定的教授名额,每所外国教授的宿舍都反映着各国的风格,外国教授宿舍区,成了各国建筑的样品展览馆。至于中国教授的宿舍,那就不同了,完全是上海式的弄堂。

齐大撤销前 选择离开

新中国成立后,一切都在改造中,齐鲁大学也正在经历着转变。在校长吴克明的带领下,为躲避战事而迁至福州的齐大医学院师生以及部分教学仪器设备,于1948年年底回到济南,随后吴克明去职,由英国人林仰山临时代理校长,1950年化学家杨德斋正式出任校长。

文学院院长是历史学家张维华,他同时兼任历史系主任,中国文学系主任是评论家田仲济。朱东润到齐大任教,就是以文学院院长张维华的名义邀请的,张维华本科毕业于齐鲁大学,燕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,师从历史学家洪业,曾跟随历史学家顾颉刚编辑《禹贡》杂志,后回到母校任职。

田仲济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,曾在济南第九中学任教,还曾任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副教授,抗日战争时期与臧克家在重庆编辑《东方文艺丛书》。抗战胜利后到上海任现代出版社总编辑、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教授,1950年调到齐鲁大学,担任中文系主任。

朱东润到齐鲁大学的时间

比较短,又遇到学校处于调整之中,因此对于齐大的很多内部情况缺少认知。关于校长杨德斋,《朱东润自传》中写道:“这个大学的校长,我只见过一面。据说是学物理的(实际上杨德斋是学化学的),他的专业成就我不曾领教过……而把他的岁月消磨于文网之中,实在是一种委屈。”杨德斋1900年生于山东胶南县,18岁到日本东京高等预备学校就读,1928年毕业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研究院,获化学博士学位,回国后任齐大化学系主任、教授,齐大总务长、校长。齐鲁大学被撤销之后,杨德斋曾任山东农学院(今山东农业大学)副院长,1972年逝世。

对于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的张维华,朱东润似乎也有自己的看法。他说:“我接的是文学院的聘书,院长张先生是以历史系主任兼任的,因此把我留在历史系,无论中文系主任田仲济怎样要我在中文系开课,张先生概不同意,因此我在工作中总感到左支右绌。”

诸事不顺,或者说朱东润新到一地有很多不习惯,致使出现认识上的偏差,这也正常。恰在此时,又因他的三篇文章在《光明日报》连续发表,引起知识界轰动。中国科学院(当时尚未分中国社会科学院)专家学者在当年五六月份先后发表了五篇带有批评性的文章,朱东润身感疲惫,因而作沉默状,将争论拖延过去。

1951年6月初,文艺理论家徐中玉从上海写信给朱东润,约他一起担任沪江大学中文系教授。徐中玉曾在山东大学中文系读书,抗战结束后被校长赵太侔聘为中文系教师,不久去了沪江大学任图书馆馆长。朱东润说:“我在齐鲁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,实在不是我的本愿,因此接受了沪江大学的聘书。临行的时候,校长一再挽留,其实齐鲁大学合并到山东大学已成定局,他的挽留与否,已经不成问题。”于是,这年秋天以后,朱东润离开齐鲁大学,到上海沪江大学任教。

1952年夏天,齐鲁大学解散,文学院历史系教师被分配到山东大学历史系,中文系教师则被分配到山东师范学院(今山东师范大学)。张维华自此加盟山大历史系,并被誉为山大历史系“八大教授”之一。同年秋天,朱东润加盟的沪江大学也被解散,中文系合并到了复旦大学,朱东润从此执教复旦大学中文系,直到1988年去世。



朱东润自传